

〔日〕弘法大師原撰

王利器校注

文鏡秘府論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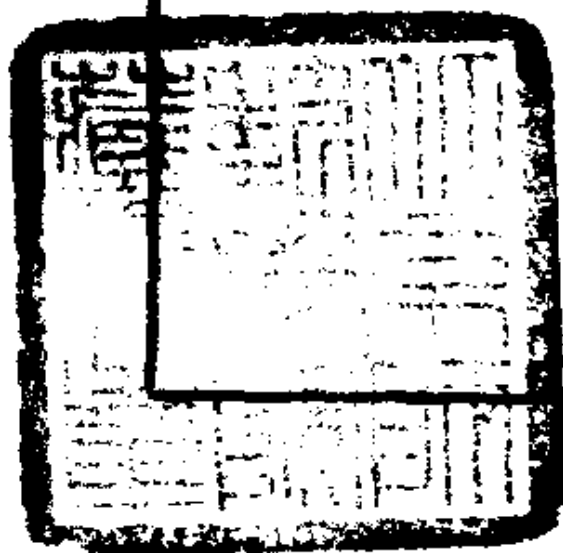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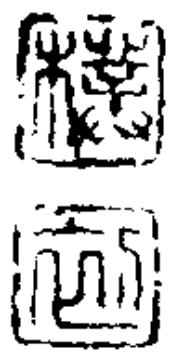
趙傑初題



# 文鏡秘府論校注

〔日〕弘法大師原撰 王利器校注

趙樸初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966028

文镜秘府论校注

〔日〕弘法大师原撰

王利器校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后学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4插页 1折页 480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 9190·022 (精)定价: 3.70元

六合配天地而曜懸不朽  
善哉我大師文心羅萬有  
音聲諧平仄名句精對偶義  
學立而情賴此同戶牖多君  
致力勤校注良不苟今古文章  
緣親情天地久

王利器先生校注弘治大師著文鏡  
秘府論待出版甚為以頌

一九八九年二月

趙朴初

趙朴初先生為本書出版所寫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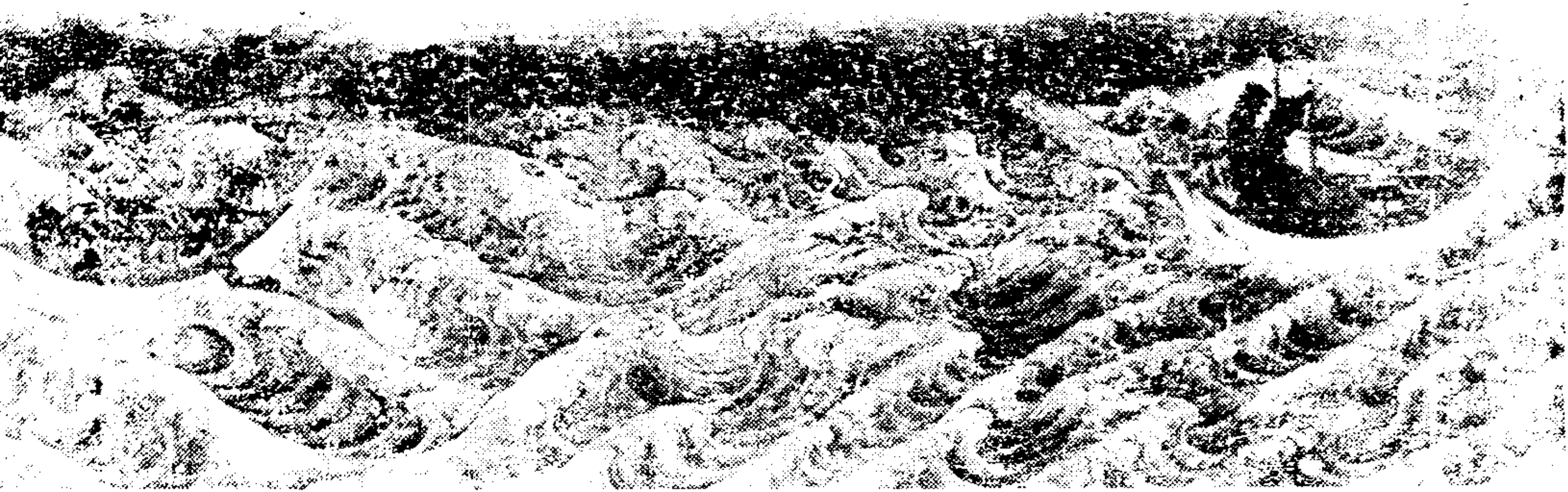


弘法大师像（日本 教王护国寺藏）

作心造乳教馳懷持  
 老民雙誓今生始立  
 惠來業終方現種  
 覺尊圓寂初道華  
 深泉開海慈厚深  
 焚龍悲著四生類  
 恒約一子衆誘他毒  
 為業勸已善任切汎  
 豎船心之役者飛拔車  
 兩空無淨利家覺見  
 國此塵夢兩諦非  
 殊愛一心為塞融度  
 成機一輩述仰如  
 如宮

龍華指歸一卷

《龍華指歸》(弘法大師手迹 日本 金剛峰寺藏)



《弘法大師行狀画卷》之一部“渡海入唐圖”(日本 教王護國寺藏)

漢文正河東先生

魚物齊銘王象賢

羅可法物名姓字

いふが  
ふれあ

目。為少味換主魁

力勸之必有所感

卷之五

為子方衛卷壽

步不周子枋枋影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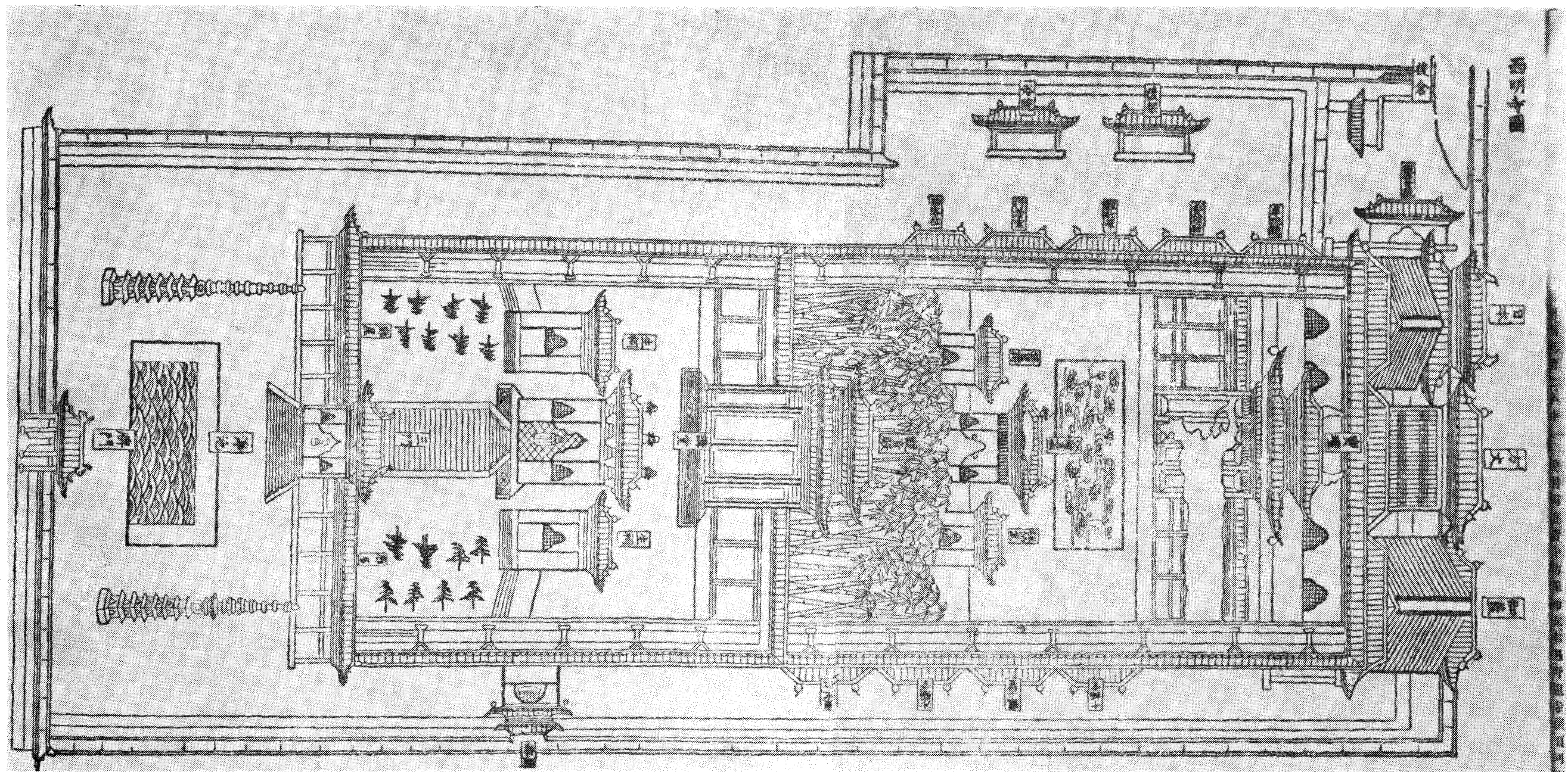
將為東來好客

初九 起時 苦睡 至

溪山景天の巻

《魚就章》(弘法大師携回日本の唐人墨迹 日本 荻原寺藏)





唐西明寺图(日本 法隆寺藏)

## 前 言

### 一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据历史记载，最初阶段主要是通过流传佛教这个渠道而发展起来的。佛教之从中国传入日本，始于钦明天皇十三年（五五二），当梁元帝承圣元年，初建向原寺于高市郡，至敏达天皇十三年（五八三），当陈后主至德元年，始建塔于大野邱。从此以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求法的，代不乏人，而尤以唐代为频繁。由于李唐王朝，对于邻国，尤其是日本，采取了“亲仁善邻”〔1〕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武后之改倭国为日本国〔2〕，从此日本就以此为国名而垂之宇宙了。又对遣唐使待以殊礼，如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写道：“司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又写道：“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3〕，这些，都是睦邻政策的具体表现。何况那时，这个“东海是西邻”〔4〕的日本，不仅“王文久已同”〔5〕乎中国，而且已然“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6〕呢。因之，自从日本在舒明天皇二年（六三〇），当唐太宗贞观四年，派出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参加的第一次遣唐使，嗣后，在整个唐代时期，派出的遣唐使竟达十九次之多。这仅仅是见诸官方的记载而已，至于民间往来，则日本人之来中国的，如王维所说的“人民杂居，往来如市”〔7〕，庆保胤所说的“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8〕，又中国人之去日本的，如张说《送梁知微渡海东》〔9〕，方干《送人游日本国》〔10〕，像这些诗篇所反映的，必然比两国政府间的交聘为多，可惜书缺有间，文献无征，今天

无从深入考查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有如鉴真之去日住锡，晁衡之为唐客卿，至今还是中、日两国人民盛传的佳话。可惜这位“好书籍”〔11〕的晁衡，在辞唐归国途中，传说葬身鲸波，也没有来得及像王维所希望的“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12〕那样的贡献，只博得当时大诗人李白《哭晁卿衡》一首挽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13〕聊寄哀思而已。

继鉴真大师从中国去日本传教之后，不久，又有弘法大师从日本来中国求法，这两位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贡献，后先辉映，各有千秋，而弘法大师在日本的影响的深远，诚如庆保胤《裔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所说的那样：“凡入唐求法之人，自宗者弘法大师，天台者传教大师，皆是权化之人，希代之器也。”〔14〕

## 二

弘法大师（七七四——八三五）是日僧空海〔15〕死后追封的尊号。空海，俗姓佐伯（一作佐伯真），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人，佛教法号叫遍照金刚。他在十五岁时，即桓武天皇延历七年（七八八）入京师（奈良），随外舅阿刀大足受《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习辞章，尤喜佛书，著《聋瞽指归》，以申学道之志。年二十四时，即延历十六年（七九七），著《三教指归》三卷，仿《子虚》、《上林》文体，以论儒释老的旨趣，假名“乞儿”，以自比况，盖所以明其对三教之有所归心，而亦将诱夫四众之偕入道场也。由此可见，大师于入唐之前，对于汉学、佛学，都有一定造诣的。

延历二十三年（八〇四），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日本又派出了遣唐使。这次使团，是由大使藤原葛野麿、副使石川道益、判官

菅原清公、富阶远成、学问僧空海、最澄（传教大师）及留学生橘逸势等组成的。他们这一行共乘海舶四艘，空海与大使、副使及橘逸势等乘第一艘，判官等乘第二艘，海中遇风飘散，空海等所乘海舶，于八月十五日在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着岸。由于当时福州境内尚未接待过日本使舶，遇到一些周折，大师有《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sup>〔16〕</sup>，说明因依；当时福州观察使为阎济美<sup>〔17〕</sup>，得书大为称赏，予以接纳，并为安排入京。十月间，大师又有《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sup>〔18〕</sup>，要求随使入京，得阎允许，遂于十一月三日成行，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长安。次年二月，大使藤原葛野麿等归国，空海与橘逸势等得唐家准许留学。大师《请来录表文》写道：“二十四年（八〇五）二月十日，准敕配住西明寺。”又写道：“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轂本朝，惟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寻《本朝高僧传》：“释永忠……又慕支那佛法，宝龟初入唐，代宗大历年也。帝闻其德业，敕居西明寺院内。”据《日本名僧传》，谓“永忠……延历之季，随使归朝”，或即此次随藤原等东归也。则空海之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盖永忠前脚刚去，而空海后脚即来也。空海与永忠当于长安萍水相逢，其后，大师学成归国，又与永忠结下了文字缘，《性灵集》卷九有《永忠和尚辞少僧都表》和《永忠僧都辞少僧都表敕答》。永忠和尚迁化于弘仁七年（八一六）四月，这年，正是大师开高野山之年，那是后话，暂提不表。

先是，“圣武天皇天平九年（七二七），帝将新大官寺，下诏觅伽蓝制式，时无知者。道慈奏曰：‘臣僧在中华时，见西明寺，私念异日归国，苟逢盛缘，当以此为则，写诸堂之规，袭藏巾笥。今陛下圣问，实臣僧之先抱也。’以图上进。……历十四年而成，赐额大安，敕慈主席。”<sup>〔19〕</sup>由是观之：日本高僧之留学长安而居住西明寺，以及圣武天皇以西明寺为蓝图而兴建大安寺，则西明寺不仅为哺育日本文化之摇篮，抑且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纪念馆了。

### 三

西明寺这座庙宇，是仿天竺祇园精舍建筑的，为唐代名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显庆三年（六五八）正月，驾自东都还西京，法师亦随还。秋七月，再有敕，法师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六五六）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sup>〔20〕</sup>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观改就普宁坊，仍先造寺。其年夏六月，营造功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耿耿，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苏頌《唐长安西明寺塔碑》<sup>〔21〕</sup>写道：“赫矣帝唐，发于天光，鸿勋铺亿载，盛业冠三代，钦明濬哲，以至高宗天皇绍元命而导要道也，时孝敬皇帝储副承祧，晦明示疾，一物三善，禀人君之量，喜而又惧，闻王子之言，以大威力，作宏誓愿，凭有为之基，获无妄之吉；粤显庆元年仲秋癸酉，诏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以报之。先是，三藏法师玄奘惟应真乎乃成果者，首命视延袤，财广轮，往以绳度，还而墨顺。次命少监吴兴沈谦之，倾水衡之藏，彻河宗之府，制而缩版，参以悬桀，钩北阜之鸟，伐南山之枚，初历落以星峙，忽穹崇以云曼，攒拱岌岌，蹇蹇宛转，揆阴阳之中，居子午之直，丛倚观阁，层立殿堂，虬凤夭矫而相承，鬼神睢盱而欲起，罔不珠缀窗寮，旋题照烛，琉璃洞彻，菡萏纷敷，白日为之隐蔽，丹雘为之舒卷者，凡十有二所，每动微风，滴细雷，窅然其来若和，鎗然其去有音，悉丰丽博敞，峥嵘睨朗，奕奕焉，眈眈焉，中国之庄严未有，《大荒》之神异所绝。”西明寺落成之日，唐高宗李治还亲自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典礼。苏頌又写道：“遂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

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有毗罗、静念、满愿、广说、鹏耆、辩子、鹭子、知会凡五十人，广京师行业童子，有空净闻、善思喜法、须迦分施、撰择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导天衢，指天寺，上御安福观以遣之，有则有容，昂昂禺禺，骈象马，错人龙，幡幢之阴，周四十里，伎乐之响，震三千界。”〔22〕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圆满佛僧创入荣眷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内殿躬御轮场观其义理事》第二写道：“显庆二年（六五七）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俗云合，幢盖严华，明晨良日，将欲入寺，箫鼓振地，香华乱空，自北城之达南寺，十余里中，街衢阗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门上，郡公僚佐，备列于下。内出绣像长幡，高广惊于视听，从于大街，沿路南往，并皆御览，事讫方还。”苏頌、道宣所描绘西明寺落成典礼，可谓盛极一时了。接着，武则天后布施青泥珠〔23〕，章怀太子李贤铸造万斤铜钟〔24〕，足见李唐王朝对于西明寺是如何的重视了。《金石萃编》卷八十六《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闾大法师碑铭序》载，高宗时怀恽“奉敕于西明寺剃落”，很好地提供了历史的证明。

当日者，玄奘法师之惨淡经营西明寺，是以天竺祇园精舍为蓝图而创建的，气象万千，蔚为大观，已略如苏頌碑、《玄奘传》所述；至于“寺额则为玄宗朝南薰殿学士刘子皋所书，入西门南壁，杨廷光画神两铺，东廊东面第一间传法者图赞，褚遂良书，第三间利防等，第四间昙柯迦罗，并欧阳通书。”〔25〕又有柳公权书《金刚经碑》〔26〕，是当时西明寺所拥有的碑文、壁画、题榜、法书，都是当时列入上乘的艺术珍品。温庭筠《题西明寺僧院》〔27〕写道：“为寻名画来过寺，……不向沧洲理钓丝。”“沧洲”是用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满壁画沧洲”〔28〕句意，即壁画一端，已为时人所艳称如此。这个寺还以盛产牡丹著名，《元白长庆集》就有元稹之《西明寺牡丹》〔29〕，白居易之《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30〕、《重题西明寺牡丹

时元九在江陵》<sup>〔31〕</sup>。陈标有《僧院牡丹》诗<sup>〔32〕</sup>写道：“琉璃地上开红艳，碧落天头散晓霞；应是向西无地种，不然争肯重莲华。”不管这首诗所指的僧院是不是西明寺，这里，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作如是观呢。不难想象，像这般“禅房花木深”<sup>〔33〕</sup>的所在，自然会像万寿寺牡丹一样，“烂熳香风引贵游，高僧移步亦迟留”<sup>〔34〕</sup>了。《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宋济条引卢言《卢氏杂说》：“唐德宗（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姚嗣卿名下，引《太平广记》此文，以为误宪宗为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则应试举子也在这里“息焉游焉”了。然而，西明寺之所以为西明寺，还有其独特的一面，就是他珍藏有如来一藏，这就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和日僧槃谭在《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所说的“西明寺藏”，这是唐代最先收藏佛教经典的宝库之一，从而成为当时钻研佛学最理想的地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载《心经》一本，题云：“《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罽宾僧般若于西明寺译。”赞宁《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写道：“及西明寺初就，诏宣上座，三藏玄奘至止，诏与翻译。……宣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又卷四《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写道：“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以类编录，号为《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又卷五《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写道：“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七八八），迄元和五载（八一〇），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当时以“英博入寺”的，除了上举之怀恽、玄奘、道宣、道世、慧琳而外，还有圆测<sup>〔35〕</sup>、良秀<sup>〔36〕</sup>、乘恩<sup>〔37〕</sup>、威公<sup>〔38〕</sup>、林复<sup>〔39〕</sup>、自觉<sup>〔40〕</sup>、顺贞<sup>〔41〕</sup>等

人，就中如道宣者，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都载有《大唐西明寺故大德道宣律师赞》一卷，圆珍《智证大师请来目录》载有《唐西明寺故大德宣公律师碣》一本，这可见当时日本僧对于西明寺大德的景仰了。外此其余，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还载有以大唐国诸帝诤相示之西明寺僧宗叡法师。这里，高僧辈出，名著斐然，林林种种，煊赫一时；如果我们说长安是当时东方的文化中心，那末，西明寺就是长安的佛教文化中心。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李唐王朝继永忠之后，又给大师提供了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不难想象，当日者，大师朝斯夕斯，藏焉修焉，寝馈不离，步趋惟谨，于景仰仪图之际，收潜移默化之功，王维所谓“不起而游览，不风而清凉，得世界于莲花，记文章于贝叶”〔42〕。裔然《上表》所谓“就三藏而稟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者，不啻是大师在西明寺中学习生活的写照了。宗叡《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后记》写道：“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生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则当时日本留学生都配住在西明寺了。

#### 四

大师住入西明寺之后，历访诸寺名德，五月下旬，与西明寺僧志明、谈胜等五六人往谒惠果阿闍梨于青龙寺东塔院而请传法。惠果告曰：“吾待子久，来何迟矣。”于是就在六月十二日于东塔院道场，入学法灌顶坛，先临胎藏曼荼罗，投华著于中台大日如来身上，阿闍梨深为赞叹，因受胎藏梵字仪轨，学三部诸经瑜伽。旋于七月上旬，更入金刚界曼荼罗，受五部灌顶，投华复著大日，阿闍梨惊叹。八月上旬，受传法阿闍梨位灌顶，得遍照金刚名号。真济

序《性灵集》引《付法》云：“今有日本沙门来求圣教，以两部秘奥坛仪印契，唐梵无差，悉受于心，犹如泻瓶吉矣。汝传灯了，吾愿足焉。”高演《弘法大师正传》一写道：“大师于是得两部密教，为本邦密宗之开祖，所谓秘密真言，此时而立也。”宋景濂有诗咏之曰：“佛陇当时谈妙法，一道红光射海东；至今显密二宗学，长伴扶桑出日红。”注云：“天台智者在时，有传教、弘法二师，来受显密二教而去，至今国中盛行。〔43〕”当日，我唐诗人如马总赠诗有云：“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朱千乘赠诗有云：“玄关护法崇”，郑壬赠诗有云：“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他们对于大师的评价，如出一口。刘禹锡有《赠日本僧智道》诗写道：“为问中华得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44〕又不啻为大师咏之矣。

与此同时，大师又从昙贞和尚学梵字。昙贞也是不空弟子，居青龙寺而与惠果为同僚者也。大师后来撰有《梵字悉昙字并释文》一书，则梵文之传入日本，也是和大师分不开的。

大师又从韩方明学书法，字体仿颜真卿，极雄伟沉着之致。韩方明有《授笔要说》，见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十，自述渊源云：“贞元十五年（七九九）授法于东海徐公璿，十七年（八〇一）授法于清河崔公邈。”大师得其传，且能发扬而光大之。毗陵子胡伯崇赠诗有云：“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嵯峨天皇《赏绫罗屏风御制诗》于大师法书有很高的评价，写道：“深山居住振奇名，冰玉颜容心转清，世上草书言为圣，天纵不谢张伯英。暂乘云岭一念隙，书得绫罗四帖屏，初见笔精鸾凤体，请看墨妙虬龙形，高岑坠石未动地，绝涧长松岂扬声，乱点乍疑舞鹤起，赴湘连似旋雁行，华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对之观者目眩曜，共赏草书笑丹青，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既知臣骨无人拟，收置秘府最开情。”大师法书真迹，至今颇有保存于日本的，无不视之为国宝了。

惠果阿闍梨传大师法事之后不久，于永贞元年（八〇五）十二月

十五日圆寂，享年六十，僧腊四十。元和元年（八〇六）正月十七日，葬于孟村龙泉大师塔侧。会葬者弟子道俗千余人，大师被推为撰碑之人。当时长安城中，大手笔、攻文僧，不乏其人，而此堂堂一代宗师惠果的碑文，竟由一介海外僧侣、且与惠果仅有半年师徒关系的空海来撰文并书字，于此可见朱千乘赠诗所谓“文学冠儒宗”者，并非过誉之词，是诚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一段佳话了。日本天台沙门安然集《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卷下载有《惠果和尚碑》一卷，则又此碑流传之有文献足征者，惜在中土已亡之矣。

大师原拟留学二十年，在既受真言密传之后，遵师命将早日归国，适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等船到，因上书请归，遂得请。这时，平日交游的僧俗，赠诗送别的，有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靖、鸿渐等人。大师亦有留别青龙寺义操阿闍梨诗，义操也是出自惠果门下的。这些诗篇，都以别易会难的笔触，表达了“喜遇深”的心情，从而谱写了中、日友好史上新的一页。

元和元年四月，他们这一行，离开长安，遄返本朝。在归国途中，大师曾于越州谒见华严和尚神秀，于神秀边得《金狮子章》及《缘起六相》一卷<sup>[45]</sup>。据《宋史》《日本国传》：“次桓武天皇，遣藤元葛野、空海大师及延历寺僧澄入唐。诣天台山传智者止观义，当元和元年也。”则大师实并传真言、天台二宗。《叡山护国缘起》载空海名刺：“僧空海（第一行）奉上（第二行）大同四年二月三日（第三行）右为天台传灯奉问比叡大禅师谨捧名书 敬白（第四行）”。则大师与天台宗之关系，亦非文献无征者，特为真言开祖之名所掩耳。

在越州时，大师有《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sup>[46]</sup>，其括书范围，“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看来这位节度使是满足了他的要求的，由后来大师所撰写的《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书观之，旁征博